

## 石景山区离休老干部

## 抗战记忆

## 姚献玉：巾帼姊妹花



姚献玉，女，1924年8月出生于安徽省全椒县。1938年1月参加新四军。1940年3月入党，抗战期间历任班长、青年队长、机要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机要股长、人事科长，北京市丰台区第18中学党支部副书记、石景山区苹果园中学校长、九中党支部书记、校长，石景山区教育局副书记、副局长等职。1983年10月从石景山区教委离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结成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共同抗日。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从1937年10月起，陆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在这个大背景下，新四军的一支宣传小分队来到了我的老家，宣传抗日救国。正在学校读书的我和大我五岁的姐姐姚献珍走出校园，听到宣传后热血沸腾，抗日救国的爱国思想越加明确。宣传小分队走到哪里，我们俩就跑到哪里。我们俩一直跟到安徽省全椒县管家坝，我俩交头接耳一商量，决定参加新四军。小分队领导嫌我岁数小，让我长大了再说。我性格很犟，凡是我决定了的事情，真是九头牛也休想拉回。不仅如此，我还勇敢地登

上宣传台演讲《花木兰代父从军故事》，博得阵阵掌声。这使小分队队长眼睛一亮！认为我有演出天赋，很有吸引观众的凝聚力。当时，部队缺少“文化人”。我们俩都是品学兼优的女学生。因此，新四军首长得知后，破例让我们加入到新四军的行列。有人管我叫“红小鬼”，将我们俩亲切地称作“大姚”“小姚”。自此，我们俩就跟宣传小分队一起到各处演出、演讲，一来，向老百姓揭露日本鬼子侵华罪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二来，吸收有志青年参加新四军，壮大抗日队伍。后来，我们俩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0年8月，我担任“新四军二师火线剧团”青年队长。每次演出都要领唱《新四军军歌》。我和战友们在部队或者地方经常演出的剧目是以东北义勇军抗日为题材的《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

《松花江上》《新编九一八小调》，还有《兄弟们拉起手来》《黄河大合唱》《渡黄河》，以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皖南事变”真相的《风雨之夜》歌曲、剧目。

我虽然没有上前线亲手端枪杀日本鬼子，但是，我的满腔爱国热血、抗日必胜的信念感染了新四军将士英勇杀敌，激励了老百姓踊跃参加新四军。1941年，我被新四军二师师部妇联会评为“妇女工作模范”；1942年，我被新四军二师火线剧团评为“先进生产者”。

日伪军对我们姐俩恨之人骨，却抓不到我们。于是，把我的父亲抓进了鬼子的炮楼。敌人对他严刑拷打，要他写信劝两个女儿投降，妄图从地址上顺藤摸瓜，找到新四军机关。我父亲打死也不肯写信，更不肯说出地址。他们又威逼我父亲登报和两个女儿

断绝父女关系。我父亲断然拒绝。父亲是开洗染布店的，鬼子黔驴技穷，竟然要父亲出50条枪、50套军装才可以把他放回家。同样，遭到父亲的坚决拒绝。恼羞成怒的伪军带着日本鬼子把染布店洗劫一空，造成几代人赖以生存的洗染家业彻底破产。

父亲说：“破产了，我还可以从头再来。我支持我的两个女儿打日本鬼子的决心，是任何金钱买不来的！”乡亲们对父亲在日本鬼子、伪军面前的铮铮铁骨钦佩不已，赞誉父亲是“民族义士”。得到消息后，我们姐妹俩同仇敌忾，誓死也要和战友们一起把日寇赶出中国！

后来，我们姐妹俩的事迹被记载在全椒县县志上，称我们俩是：巾帼英雄，姊妹花。

文字：赵连文 图片：岳星

## 赵耀华：抗战经历二三事

## 100个铜板的来历

我上学比较早，1937年那年我十岁，就小学毕业了。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诈言占领任丘县：国民党都跑了。我们的地下党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斗争。我们继续上学——上了抗日高小。日本人1939年开始占领我的家乡任丘，当时十二三岁的我拿着大刀参加了儿童团，抓特务，抓汉奸。当时的时代背景——日本派了很多汉奸，侦察我们的军事行动和我们的抗日组织状况。一次，我在站岗，村武委会干部纪花来查岗，我没有见过她，她也没有通行证，我把她抓住了，把她押到了武委会，她对武委会主任说，她编了一堆瞎话也没有骗了我，她对武委会主任连连夸奖我说，这小子，警惕性高。她从兜子里掏出了100个铜板对我进行了奖励——这是村武委会，第一次对我的奖赏！

## 智对日本军妓

1941年10月初，县游击大队得到情报，称有日本驻任丘慰安所派出两辆汽车，大概一个班去天津接慰安妇。我们决定在张各庄截击这两辆车。此次战斗击毁汽车一辆，打死日伪军15人，俘虏9人（日本妓女）。缴获长短枪30支及子弹一部分。

战斗结束，打扫完战场，部队将9名日本妓女交由民兵押送去郭庄兵站。这些日本女人脚穿木屐，故意耍赖不走，幻想日本人来救她们。民兵王章认识我，招呼我帮忙，协助他们尽快走出危险地带。妓女中有一个年龄稍大的，带头不好好走，我就假装用棍子要打她，她赶紧说道：“别打我，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这9个人中有日本人3个，朝鲜人4个，中国人2个，我是大夫，另一个是护士。”我问她为什么和日本人混在一起？她说日本人在沈阳医院把她们征调来的。我借机让她做了我们的翻译，告诉这些日本慰安妇，八路军不杀俘虏，还优待听话的，让她们抓紧时间赶路。我们走到渡口，兵站有人接，办理了交接手续，眼看着俘虏上兵站大船开往上游去，此时我们才算完成任务。

## 地下交通员生涯

我家住河北省任丘县，属于冀中地区。1941年，敌人在华北的重点是（北）平、（天）津、保（定）和太行山区。对敌人威胁最大的根据地是晋察冀的冀中区和太行区。敌人的进攻目标是摧毁抗日政权，消灭八路军、游击队。年底，我发现平、津、保及沿铁路线，日寇大量增兵，沿交通线安据

点，沿铁路线挖封锁沟。种种迹象是要大举进攻，企图占领的征兆。抗日政府也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精兵简政，转入地下。正在这时我村教师张先生回家探亲遇上鬼子讨伐队，被抓进任丘县城鬼子宪兵队。张先生受不了鬼子的严刑拷打，供出了我村的抗日政权，包括群众团体、民兵、少先队、儿童团、联络站。第二天鬼子纠集汉奸包围了村庄。张点名抓我村18名干部。幸好鬼子在高阳打了败仗，紧急调走增援去了。汉奸队大队长是我方派人，等鬼子前脚走，后脚他就把被抓的人给放了，才没有暴露大的秘密。村党支部决定解放联络站，可上级不同意，因为我们村这个联络站在延安党中央机要处是挂了号的。冀中区党委下令不但不能解散，还要转入地下，加强领导，为的是不使中央和山东、华东两个大区断了联络。上级委任我父亲赵介为站长，拨下经费购置必需品，并让我父亲卖地五亩当本金开药铺作掩护，字号“公益堂”。地方联络及情报交阎忠叔去办。情报站名义上解散了，村中战勤人员不能送了，得找可靠人员送。因我当时在大王庄读书，大王庄距我村三里，此事就落在我身上了。当时的情报分类有平安、急、特急级别，不许拆看，不许传

递。每日上学前去取，风雨无阻。提供情报的是在伪政府、新民会、维持会做事的我方地下情报人员。我将情报送到李婶家，李婶给我一个副牌为信号，表示送到了。下次交牌领情报，循环使用。这项情报传递工作我干了一年半时间，没有出过差错，受到了表扬和奖励。

我的另一项任务是为抗日政府传递物品和信件。任丘县第一区政府在议论堡镇，日本人占领后，抗日政府离开驻地，隐蔽在乡村打游击。当年日伪军封锁很严重，我政府办公用品和子弹、西药、电池以及伪军装、伪政府公文、良民证、伪币等等，我方没有全靠镇上供应。当然我们也通过走私采购一部分东西，比如从天津、保定大城市运来时，也得经过城镇公开运来。人家不知抗日政府在什么地方，这就必须要通讯联络。当时敌人封锁、缉拿通共商人也很紧，为此暴露的，也有人坐牢或被杀头。而通讯联络之事，人须胆大，还得可靠。他们利用我这个小孩子的有利条件，作为中间跑腿联络，不容易暴露。交给我任务时，把接头人是谁、暗号、什么样的东西，注意什么，走哪条路线，谁护送等等，说得很清楚，我照办就可以了。对于重要文件传递，机密信



赵耀华，男，1928年7月出生，河北省任丘县人。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7月从石景山区政协副主席岗位离休。

件，还教我如何伪装，如把机密件放在馒头内的方法，就是老机要员王文告诉我的。做法是由我母亲蒸了馒头，晾好了，揭下皮，挖掉一部分心，装上信后再封好皮，点上红点，点少的就是信馒头。

1943年日伪军撤去了外围离城远的据点，工作结束时，政府重奖我一支“国权”牌金笔、一身军装、一双球鞋，外加300元边币奖金。

文字：王进 图片：钟国庆